

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百年历程与宝贵经验

付高生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江西 南昌 330108)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围绕城市这一场域开展的各项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在城市建党的基础上,先后经历了革命夺城、工业兴城、经济富城、人民治城的演进历程,期间推动城市权利不断丰富、城市管理不断完善、城市工作领域不断健全、城乡融合不断深入,使中国城市从服务少数人利益的反动堡垒发展成为人民寻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场域。中国共产党百年城市工作蕴含了诸多有益经验,其中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就是其中的一条宝贵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的城市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21)04-0008-08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CPC's urban work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FU Gaoshe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Ji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Nanchang 330108, China)

Abstract: The CPC's urban work mainly refers to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urban area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CPC's great cause.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based on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in cities like Shanghai and Jiaying, CPC's urban work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revolutionary winning of the c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economic prosperity of the city and people's governance of the city.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CPC has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urban right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urban management, the continuous widening of urban work fields and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o that cities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from a reactionary fortresses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few people to an important front for people to seek a better life. The CPC's 100-year urban work contains many useful experiences, among which the adherence to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urban theory, one of the valuable experiences, is of vital enlightenment to push the urban work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he CPC; urban work;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urban theory

城市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指围绕城市这一特定场域开展的各项工作,包括城市经济工作、城市宣传工作、城市卫生工作、城市工运工作等。城市工作贯穿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整个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北京、上海、长沙、济南等城市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

已经在一些城市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等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夺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浴血奋斗的革命征程。在此期间,党注重领导开展好城市的工会、经济、宣传等各项工作,以此实现城市工作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互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并要求党在这一新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1]1427}。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城市工作视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推进城市工作与社会主义现代

收稿日期:2021-07-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26)

作者简介:付高生(1988—),男,江西万年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

化建设、改革的互动,使城市工作成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事项。应当说,城市工作不同于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治理,是一个较为广义的概念。后三者可视为党在执政条件下开展城市工作的一些具体方式。

当前,学界对党的城市工作的研究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路径:第一种研究路径以阐述中央领导人的城市工作思想为主,如关于毛泽东^[2]、张闻天^[3]、陈云^[4]、习近平^[5]等领导人的城市思想研究;第二种研究路径以分析特定历史时期党的城市工作思想为主,如对全国性抗战初期^[6]、解放战争时期^[7]、新中国成立初期^[8]等特定时期的城市思想研究;第三种研究路径以反思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城市工作思想为主,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城市化的进程研究^[9]、理论与模式研究^[10]等。总体上看,既有成果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发展历程、思想内涵、时代价值等层面的认识,但相对而言较为缺乏结合党的整个历史系统阐述城市工作的发展历程、成就、启示等。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党的许多工作亟待反思总结并从中提炼经验启示。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11]。就此而言,立足建党百年这一历史节点,深刻学习党的百年城市工作的历程与成就,从中汲取推动新时代城市工作的经验启示,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当前学界已经有学者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如宋学勤总结了百年来党治城市的三次转折、所坚持的人民立场以及兼收并蓄以我为主的学习态度^[12],刘吕红则阐释了百年来党领导城市工作的演进历程、现实审视及基本经验^[13]。笔者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以百年党史中党的中心任务为视野从宏观上梳理党的百年城市工作的演进历程,揭示党的百年城市工作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围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阐述党的百年城市工作所孕育的经验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城市工作的演进历程

回顾党的百年城市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前提,没有 1921 年在上海、嘉兴这两座城市的建党活动,就不会有百年来党的城市工作的系列

辉煌成就。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城市的现代化道路也随之走上了历史的正轨。百年党史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本研究结合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的百年党史,依据各个时期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将百年城市工作划分为革命夺城、工业兴城、经济富城、人民治城的演进历程。

1. 革命夺城(1921—1949):革命时期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科学地揭示了城乡分离、城市发展的必然性,深刻指出“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14]。美国城市思想家乔尔·科特金也高度赞同城市的进步性,他指出,“在长达 5000 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所眷恋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质进步的主要场所”^[15]。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城市总体上构成了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甚或经济中心,成为彰显区域发展的显著标识。由于城市在地缘战略上的繁荣性、重要性,侵占和控制城市往往成为侵略一个国家的主要方式。晚清中国及其一些主要城市就遭此厄运。由于闭关锁国等主客观原因导致的国力贫弱,晚清中国被迫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侵占下打开国门,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城市开始丧失主权,成为西方列强在法外之地。面对以城市陷落等为标志的国家危机、民族危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奋起反抗,力图实现驱赶列强、恢复主权、救亡图存的目的。但无论是封建阶级的保皇派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革命派,由于阶级落后性、阶级局限性等各种原因,他们都未能实现驱赶列强、恢复主权的使命,城市主权依然尚未完全恢复。

由于城市居于中心地位,城市主权是否完整是衡量一个国家主权完整程度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城市主权丧失的危机,使得解放城市、恢复城市主权成为中华民族恢复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1921 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接过了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接力棒,从此改写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也改写了中国城市的命运。

随着 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通过 28 年的浴血革命顺利完成了革命夺城的历史使命,恢复了城市主权,使中国城市发展矗立在了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里有两件史实需要注意。

其一,在 28 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收复

城市主权大致经历了三个革命阶段：“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16]的城市中心主义革命阶段（1921—1927），“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阶段（1927—1945），以及城市工作与乡村工作同等重要、未来要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阶段（1945—1949）。这段历程显示了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即从以城市工作为主转向以乡村工作为主再到以城乡并重、并由城市领导乡村为主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城市工作重点的转变，即从以城市暴动为主转向以乡村革命为主再到以攻打城市、解放全中国为主的转变。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在第二个阶段，乡村工作虽然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城市工作的重心“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17]，但不能因此忽视乃至否认夺取城市的最终目的。正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伟大思想中所暗含的那样：建立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基础上的政权只能代表着局部的、阶段性的革命胜利，而只有把政权建立在收复城市的基础上才能视为全局性的、最终的革命胜利。因此总体看，在看到党的中心任务与城市工作重点发生改变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只是改变了夺取城市的革命形式即从以城市革命为主夺取城市向以乡村革命为主间接夺取城市的转变，但夺取城市的最终目的并未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党对城市地位的重要性是有深刻认识的。

其二，在革命时期，党的城市工作不限于夺取城市，也积累着如何建设城市的经验。比如，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时期党的城市防疫抗疫工作就为新中国的城市卫生工作积累了充分的经验；解放战争后期党对石家庄、沈阳等城市的接管为在全国范围内接管城市、解放城市以及治理城市提供了重要经验；特别是党在革命时期的工运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城市工运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2. 工业兴城（1949—1978）：建设时期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

以新中国成立为节点，中国共产党步入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新阶段。如何把一个百废待兴的农业国家建设成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时期的新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特别是前苏

联城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把城市建设作为建设现代化工业国家的重要着力点，实现了从夺取城市向全面建设城市的转变。

由于传统中国的城市总体上是消费型城市，自身缺乏产业基础，也没有带动广大农村发展的能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优先发展城市的产业基础。对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做出了明确指示，他指出要“着手我们的事业建设”，就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其中第一要注重“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要注重“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要注重“手工业生产”^[11428]。在这一重要论述中，工业成了新中国城市建设和生产的主要内容，实质上开启了以工业主导城市复兴、以城市建设推动工业大国建设的“工业兴城”过程。比如，新中国建立初期北京市委制定北京城市规划的前提就是把北京建设成大工业城市和现代化的工业基地。随着工业兴城的推进，城市聚集效应与辐射效应日益明显，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城市。从1949年到1960年，中国城镇人口平均年增长达660多万，11年间城镇人口总量增长了2.3倍。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导致城市出现粮食供应紧张、住房短缺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推进三线城市建设、压缩城镇人口等措施，使工业兴城进程得以平稳发展。但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国内工业发展遭受影响，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也遭受波折，这些都使工业兴城的进程停滞不前。总体上看，建设时期的工业兴城举措在短时间内复兴了大多数城市，发挥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由于以建设生产型城市为主，特别是重视城市中的重工业建设，致使这期间城市的消费水平受到了影响，不仅在整体层面上限制了城市的全面发展，也在个体层面上制约了市民的城市生活质量。

3. 经济富城（1978—2012）：改革时期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

1978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大会强调要发挥城市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求城市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18]，标志着城市建设进程的重新开启。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由此正式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时期不同于建设时期的最大之处，在于党

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而展开。城市建设自然也需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经济建设的直接目的在于富起来，因此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党的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发展经济中推动城市富裕即经济富城。

相较于工业建设，经济建设的内涵更加广泛，也更加契合人民对“富起来”的需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城市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从纵向比较看，国内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均逐年增长，其中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343 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21 810 元；人均消费支出则从 1978 年的 311 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15 161 元，人民的城市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从横向比较看，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速较高，呈现出快速发展与稳定发展的奇迹，与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差距正逐渐缩小。2011 年，上海 GDP 已超过新加坡、韩国首尔，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化的比较优势。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与经济建设在互动中均得到了飞速发展，城市经济状况、人民城市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总体实现了经济富城的目的。但由于侧重追求城市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一度陷入唯 GDP 主义，呈现为温家宝所言的“不完全的城市化”^[19]，衍生出以农民工融入难、交通拥堵、城市历史文化破坏严重、城市生态严峻等为主要症状的城市病，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寻求。

4. 人民治城（2012—）：新时代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建设时期，城市建设主要受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设的主导，这一时期的城市可谓工业发展的容器；在改革时期，城市建设主要受经济建设的主导，这一时期的城市可谓经济增长的机器。而无论是作为工业发展的容器，还是作为经济增长的机器，这两个时期的城市建设都没有处理好人与城市的关系问题，没有很好地凸显社会主义城市的人民属性。

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迈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这一发展思想的指引下，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改革举措，明确强调

要“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20]。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特色所在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立场融贯到城市建设中，其核心要求就是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城市建设，实质上就是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人民城市。人民城市思想的提出，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的维度看“符合城市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再政治化’的当代趋势”，从思想史的维度看则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批判和列宁关于城市与人民关系的论述”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的中国化”，可谓城市发展观的重大创新^[21]。在具体实践中，这就意味着“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22]，把城市定位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依靠人民治理城市、由人民共享和评判城市发展成果，质言之就是开启人民治城的城市发展新道路。总体上看，新时代党提出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顺应了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诉求，实现了对作为工业发展容器与经济增长机器的城市定位的理念超越。只要沿着人民治城的道路走下去，社会主义城市的人民属性必将日益彰显。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城市工作的主要成就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城市百年来从当初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国民党反动势力所占据的反动堡垒跃升为拉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从而彻底地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折射出中国的百年巨变，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百年中国城市巨变取得了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主要包含城市权利不断丰富、城市管理不断完善、城市工作领域不断健全、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等。

1. 城市权利不断丰富

城市权利由列斐伏尔率先提出，主要指人民有占有城市、选择城市、进入城市、参与城市建设以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权利。从起源上看，城市权利既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天赋权利，也不是一项基于人与人之间简单约定而成的契约权利，而是一种基于人类实践的社会革命、社会变革、社会博弈的产物，这就导致城市权利从过程上看呈现为“一种有待实现的总体性”^[23]。就此而言，城市权利可谓一种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现实化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城市权利大体经历着这种现实化的过程。

近代中国的上海、厦门、北京、天津、南京等城市由于列强入侵,成为他们的国中之国。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这些被入侵者占领的城市成为禁地,从而丧失了占有城市、自由进出城市谋取生活的权利;对于当时的政府无论是之前的清政府还是稍后的国民党政府,他们都丧失了对这些城市的独立的行政管辖权、规划权。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民主革命解放了这些城市、恢复了城市主权,这正是党在革命时期通过革命夺城为人民实现的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城市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层面上恢复城市主权的基础上,人民群众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追求和实现更大范围城市权利的新阶段,虽然中间有曲折,但总体上表现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上城市权利的不断丰富、发展、完善。比如就城市生活权利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为一般群众营造一个安全、卫生、文明、有序的城市生产生活条件,而且高度重视保障城市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早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领导探索设立了城市救济制度,在改革时期则进一步升级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不断提高保障标准、不断扩大保障对象、不断拓展保障项目、不断健全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机制,为城市困难群众积极搭建了一张安全、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网,有效满足了他们的生存型生活资料需要以及发展型生活资料需要,从而确保了他们的生活有尊严、有体面。

2. 城市管理不断完善

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时,中国的城市也迎来了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点。一个新的极为敏感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并管理好满地战争创伤的城市吗?”^[24]检验城市管理的成效,既要从结果维度看城市管理者是否推动了城市发展,也要从主体维度看城市管理者的组成结构。而从结果与主体两个维度回顾70多年的中国城市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这段历程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夺取城市、解放城市,同样能够治理好城市、管理好城市。

一方面,从结果维度看,在党和政府领导推动

的城市化下,2011年的中国常住城镇人口数量已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51.27%,学界据此认为中国实现了从传统乡土中国向现代城乡中国的历史性转变。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也高度肯定了这一成就,指出“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25]。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中国城市化现状,进一步提出了提高户籍城镇化率的要求,此举正在推动中国从城乡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将为推动中国城市发展迈向新台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从主体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治理城市、管理城市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地优化城市管理的主体结构。在中国,城市权利在名义上属于人民集体所有,但在具体的权力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各级党委代表人民成为城市的执政主体,城市的各级政府组织则代表人民成为城市的行政主体。因此,人民是否能够从名义上的权利所有者落实为实践中的权力行使者,有赖于城市党委和政府的授权或赋权。回顾建设、改革、新时代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人民有权利参与城市的管理、治理,并从理念上实现了从城市管控、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变。这种理念上的变革导致人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实践变革,使人民从建设时期的城市被动管理者、改革时期的城市有限参与者转变为新时代的城市积极治理者。在新时代的城市治理中,城市中的党委、政府和其他主体之间不再是管理-被管理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呈现为地位平等的、作用具有层次性的协作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在城市治理中发挥城市党委的领导作用、政府的服务作用、社会的主体作用,不仅大力提升了新时代的城市工作绩效,而且大幅提振了人民参与城市的积极性。

3. 城市工作领域不断健全

城市工作是一项综合工程,涉及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同时,城市工作也是一项开放的工程,即城市工作不会一开始就涉及全部领域,而是随着实践的推进,逐渐地从部分领域深入更多领域。换言之,城市工作领域会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健全。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其中蕴含的城市工作历史就呈现出工作领域不断健全的特征。在革命时期,由于革命是党的中心工作,党

的城市工作主要在于从政治领域组建党的城市组织,以及从文化领域宣传马列主义,以更好地组织工人群众、宣传工人群众、团结工人群众,从而巩固壮大革命力量。建设初期,由于党高度重视发展经济,党的城市工作不仅注重做好政治领域的清正廉洁、社会民主、管理机构设立等工作,而且注重做好文化领域的社会风气改造等工作、经济领域的三化一改等工作以及社会领域的社会安全、民生保障等工作。其后,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城市工作遭遇波折,各个领域的工作出现波动乃至停滞不前的问题。改革时期,党中央拨乱反正,确立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由此使党重新恢复了在城市工作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项工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城市工作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性,从而使城市工作由革命时期注重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二位一体、建设和改革时期注重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扩展到新时代注重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使城市工作的领域不断健全,能够更加顺应人民日益丰富、多元的城市美好生活需要。

4. 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居住空间的两种基本形式。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私有制下城乡从分离走向对立的必然性,并认为随着私有制的解体,城乡也将从对立走向融合。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批判了杜林把私有制下的城乡对立视为永恒的错误观点,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解体,“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26]。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创造性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早在革命时期就很注重城市工作与乡村革命的相互配合。为处理好新中国成立后的城乡融合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城乡兼顾的思想,告诫全党同志决不能只顾城市、丢掉乡村,而是“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1]1427},强调“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27]。但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城乡二元政策的推

行,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出以乡哺城的特点,以城带乡的功能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从而导致毛泽东的城乡兼顾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改革开放后,为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城乡兼顾思想,先后提出了城乡互动、城乡协调、城乡统筹以及新时代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破除阻碍城乡融合的思想束缚;在实践上则进一步完善了城乡融合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在做好城市工作的过程中积极发挥了以城带乡的功能,开启了城市工作反哺农村工作的新进程,极大地改善了乡村面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采取城乡一体化等措施,结束了千百年来困扰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使城乡融合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城市工作的宝贵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永恒主题,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接续发展的历史。由于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元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内在包含并要求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从党的百年城市工作历程看,中国共产党也确实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同城市工作良性互动的过程,这种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党的百年城市工作之所以取得一系列历史成就,是与其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分不开的。由此,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成为党的百年城市工作蕴含的一条宝贵经验,为推进新时代的城市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1. 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为一种基本原理、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也体现为一种基本原理、科学方法,很难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工作的现成指南或直接答案。党的百年城市工作历程充分证明:如果按照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直接照搬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则很可能会误导甚至阻滞党的城市工作进程,进而延误党的其他各项工作;只有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才能指引党的城市工作不断前行,进而有利于推进党的其他各项工作。比如,在革命初期,党内主要领导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反动势力统治

城市强与俄国反动势力统治城市弱的差异,没有充分认识到党领导的军队力量与反动势力领导的军队力量的差异,直接照搬俄国的城市革命理论,认为中国应当像俄国一样实行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暴力革命,据此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的政权,其结果就是各种城市革命在反动势力的强势防守和反攻下不断败退,致使党和军队遭受重大损失,革命跌入低潮。在反思城市中心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当时反动势力统治城市强、统治乡村薄弱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革命道路,其结果就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政权的任务,充分证明这条道路走得对、走得好。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城市形成专题性、体系化的探讨,但其文本中蕴含丰富的城市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思想源头,对于当前开展新时代城市工作仍具有跨越时空的指导价值。新时代,一方面需要系统挖掘和深度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城市思想,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打下坚实的理论前提;另一方面需要下一番关于中国城市调研的真功夫、苦功夫,充分调查和科学分析城市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现状,实现对城市发展特殊规律的掌握、认识和运用,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之“矢”射中新时代中国城市实际之“的”,最终拟定推进城市工作的相关思路、方针、政策等。

2. 在中国城市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在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在城市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共产党从多个维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发展,其中政治维度与价值维度是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维度。政治维度上,中国共产党注重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通过在城市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实现了党建对城市工作的有效引领,使中国城市在28年(1921—1949)的时间内就恢复了主权,实现了从“一个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服务的城市,变成为人民、为生产服务的城市”^[28];在90年(1921—2011)的时间内实现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跨越;在100年(1921—2021)的时间内大幅度缩小同发达国家城

市数百年方才达到的现代化成就差距,甚至有些城市已经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城市的现代化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城市工作坚持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国外城市发展坚持突出政府领导作用或市场主导作用形成了鲜明差别,深化了关于城市党建理论的认识。价值维度上,中国共产党注重体现“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29]这一价值底色,通过解放城市、发展城市、治理城市,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重要平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石。回顾党的百年城市工作,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城市治理一直以来的根本立场”^[12],与国外以服务资产阶级利益为导向的资本城市形成了鲜明差别,深化了关于人民城市理论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发展党的城市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城市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推动城市工作由管理城市进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构成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富矿”。这可以得出在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一个可行方向,即从这种富矿中提炼新的城市话语。话语是理论的核心载体,好的城市话语(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城市治理”“人民城市”)能够更有效地传播城市理论、发展城市理论。从新时代城市工作中提炼科学、合理的新话语,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讲好中国城市故事、抢占城市理论话语权等多重功能,需要引起重视并进一步予以推动。

3. 合理对待国外城市理论和中华传统城市思想资源

从理论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中国化,还包括国外城市理论的本土化以及中华传统城市思想的时代化。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国外城市理论和中华传统城市思想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城市工作历程提供了探索这一问题的方向。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苏为师”方针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城市的过程中主要是以苏联城市理论为指导,但与此同时也注重借鉴中华传统城市思想中有关空间规整、功能分区、天人合一等有益资源,从而一定程度上

在制定城市规划、推进城市发展等层面避免了完全的“苏联化”，体现出中国特色，在推进城市工业化过程中保存和延续了许多城市文脉。改革开放后，在追求城市发展世界化、国际化的趋势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广泛借鉴社区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大都市圈理论、海绵城市理论、生态城市理论、智慧城市理论等各种国外城市理论，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城市发展与世界城市发展的接轨，使中国城市面貌出现了巨大变化。但同时，由于把世界化、国际化误等于西方化、欧美化，一些城市地方党委和政府运用西方城市理论时不加反思、不加鉴别、盲目运用，其结果就是使“不少城市变为各类外来规划理论的试验场”^[30]，进而在实践上出现各种备受诟病的规划乱象如千篇一律的洋大楼、破坏性开发导致的城市文脉割裂等。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国化是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为指导的，但同时也应当注重合理借鉴国外城市理论和中华传统城市思想资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需要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指导地位、推动国外城市理论本土化和中华传统城市思想资源时代化的过程中实现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新发展，进而为指引和发展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更为务实有效的理论指南。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杜玉芳. 毛泽东与建国前后的城市工作[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40-44.
- [3] 施松寒. 张闻天对城市工作的贡献[J]. 人文杂志，1990(6)：97-101+23.
- [4] 董志铭，常琦. 陈云城市管理思想探析——以沈阳接管为例[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4(1)：57-62.
- [5] 何绍辉. 把城镇化路子走正——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镇化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J]. 毛泽东研究，2020(4)：26-33.
- [6] 武晓华. 全国性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政策的演变探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8)：79-83.
- [7] 王金艳.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D]. 长春：吉林大学，2010.
- [8] 张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研究——以北京市为个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9] 张新华. 中国共产党推进新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研究[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 [10] 刘士林. 城市中国之道：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化理论与模式研究[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
- [11] 习近平.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N]. 人民日报，2021-02-21(1).
- [12] 宋学勤. 中国共产党探索城市治理规律的历程与经验[J]. 国家治理，2021(14)：26-30.
- [13] 刘吕红. 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的百年历程、现实审视及基本经验[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4)：13-21.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7.
- [15] 乔尔·科特金. 全球城市史[M]. 王旭，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82.
- [16]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72.
- [1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111.
- [18] 王黎锋.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召开的历次城市工作会议[J]. 党史博采(纪实)，2016(7)：58-60.
- [19] 温家宝：政府必须树立新的执政理念[EB/OL]. 中国政府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9-11/4176144.shtml>.
- [20]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15-12-23(01).
- [21] 刘士林. 人民城市：理论渊源和当代发展[J]. 南京社会科学，2020(8)：66-72.
- [22] 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20-11-13(1).
- [23] 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M]. 李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3.
- [24] 张在元. 中国城市主义[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14.
- [25] 傅高义. 邓小平时代[M]. 冯克利，译. 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3：653.
-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4.
- [2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60.
- [28] 新华社电讯. 上海庆祝解放三周年[N]. 人民日报，1952-05-31(02).
- [29]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11-04(02).
- [30] 曹康，贾淑倩，郑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国际化历程研究[J]. 规划师，2019，35(19)：5-12.

责任编辑：曾凡盛